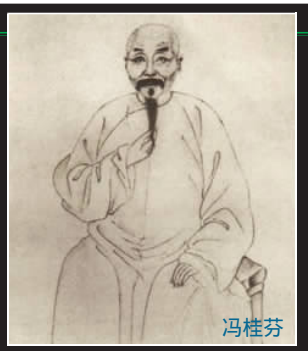


# 清末武科举变革中的改良派与革命派探析

□ 王晓勇



清代武科举考试始于顺治三年(1646),曾选拔出大量优秀的军事人才,在清代中前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军事斗争的屡屡失败迫使清王朝上至统治者,下至民间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固有的武举选士制度缺陷,由此拉开了长达六十余年变革与存废武举的大讨论。主张变革武举增设新式科目的改良派与主张废止武举采用新法取士的革命派交替登场,各陈利弊,展开了清代武举史上一次大讨论。

## 一、清末武举改良派的主张与评析

改良派主要是主张变革武科举考试,通过对科目的改革达到获取有用之才的目的。

改良武科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他在《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他看来,西方的军事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西方人鸦片战争的胜利依靠的是船坚炮利,主张在适宜水师操练的“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船,造飞机、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sup>[1]</sup>。魏源的这一主张为武举变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启迪了后世的主张变革武举之士。

魏源之后,翰林院庶吉士徐鼐在1859年《上大府请武场添试火器折》中,指出在江南北剿灭太平天国时,黑龙江之兵使用弓箭默默无闻,而吉林之兵使用火枪屡次建立功勋,并结合实战的地理因素上分析了弓弩作战的弊端“盖铁骑弓弩,驰骋注射,利于旷野,不利于险阻”<sup>[2]</sup>。提出乡试除考试马步

箭外,加试火枪考试的想法,希望利用民众“急功近名之心”,促进民众对于火枪的熟练使用,同时收到减少添置火枪手、火枪的军费开支、加强地方武备力量的效果。但这一主张忽视了普通民众对于耗资巨大的新式枪炮经济承受能力,容易导致武科考试录取人数不足额的情况出现。

在主张改良武举的众多声音中,王韬的观点也很有独到之处。他认为武科选拔出的人在实践中之所以发挥不出人们期望的作用,并不是立法不完善,主要是由于武科之人“专重弓刀石而已,演练兵兵亦已骑射为先事”<sup>[3]</sup>。“所谓制胜长技并不在此”。因此在变革武举方面,他主张“改试常法”,以学、艺、力三科取士,分别选拔“明晓山川扼要,熟悉行阵进退,料敌审势,屯营设伏,无不具有方略”的军事谋略人才、“建营垒、筑炮台、造枪械及一切攻战守御之器具,因敌而施,无不布置有方,深中要害”的军事工程人才和“发炮鸣枪,命中及远,洞坚折锐,荡决无前”的军事战斗人才。到了1883年,王韬进一步明确提出“武科宜废弓石而改试枪炮”<sup>[4]</sup>的主张。而另一位清末思想家郑观应,在变革武举这一点上与王韬所见略同,在其1884年的《盛世危言》中,提出与王韬三科取士类似的“三等考试”办法,即“一试能明战守之宜,应变之方,深知地理险阻设伏应敌者。二试能施火器,命中及远,驾驶战船,深知水道者。三试制造机器,建筑营垒炮台,善造战守攻诸具者”<sup>[5]</sup>。王韬和郑观应主张的考试法,能从改变传统马步箭弓刀石单一科目取士模式入手,适应热兵器时代新

式军事战争对于战备、谋略、工程人才的要求,较之先前魏源的常科外增设水师科和徐鼐的马步箭试外加试火枪考试,改革力度更大,也更为彻底。但他们的主张对于掌握新式课程的考官、考试器具要求非常高,能否有足够的条件满足也成了付诸实施的最大障碍,另外,三科取士需要应试者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而大部分武举生员对于新课程甚至闻所未闻,更谈不上应考了,因此实施的难度较大。

改良派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张佩纶,他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另辟蹊径,在1884年上奏的《拟请武科改试洋枪折》中奏称:“中国诚危之耻之,则莫如变法,变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sup>[6]</sup>提出武科改试洋枪一项举措,可以解决以下多项问题:官办兵工厂销路“若天下皆须洋枪,皆须子药,则官局造枪不患不售……而艺事无旷”,推动民间投资军火业“本集于商,权总于官”;官办与民办军工企业的发展又可以避免购置外洋枪炮导致的“银帛漏于外洋”达到“军资大饶于内地”的效果,间接刺激煤矿的开采:“厂商日盛中,枪日精,必争开煤铁之矿以自便”,售枪于生童“每杆视局价增一二两……官帛可省,局用可充”等等。事实上张佩纶的建议考虑虽很周全,却对将洋枪流散于民间的危害性估计严重不足,早在清初建时期,就曾为防止人民反抗,颁布政策禁止普通民众私藏兵器,只允许应试武举之家保留“弓一张,箭九只”。即使在社会高度和谐的今天国家都不允许民间私自保有枪支,更何况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

东北对外贸易与外汇市场,改由朝鲜银行统一发行金圆纸币,横滨正金银行只发行银元纸币。从1913年7月截至1917年12月底,横滨正金银行在东北发行的金圆纸币为4538340元<sup>[7]</sup>。

综上所述,横滨正金银行在中国东北大量发行银元票、金票等纸币,严重侵犯了中国的货币发行主权,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造成中国币制更加混乱,阻碍了中国币制的统

一。这种非法的纸币发行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巨额纸币的发行和流通,有利于日本对华资本输出和在中国倾销商品、收购原料,加强了日本对华的经济渗透和资本扩张。横滨正金银行化纸为金,滥发纸币,以纸币作为货币资本换取中国的物资和金银,辗转盘剥,掠夺了中国大量的财富,严重摧残了中国的社会经济。

参考文献

- [1] 曲振涛. 外国货币侵华与掠夺史论(1845—1949)[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 [2] [日]土方晋. 横滨正金银行[M]. 东京教育社, 1980.
  - [3] 侯树彤. 东三省金融概论[M]. 上海太平洋国际学会, 1931.
  -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 第3辑(金融)二[Z].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 [5] 姚会元. 日本对华金融掠夺研究[M]. 武汉出版社, 2008.
  - [6] 曲振涛、张新知. 外国货币侵华与掠夺史论(1845—1949)[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 [7] [日]荒木光太郎. 货币制度概说[M]. 东京日本评论社, 1933.
- ★作者郭立彬为邢台学院法政历史系讲师。

不久,封建统治内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民众反抗运动风起云涌的晚清时代,这一主张从经济角度或许确实有效,但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角度来看是绝对行不通的,奏章最终亦未能引起朝野多大反响。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的再次对外战争惨败震惊朝野,之前曾一度销声匿迹的改革武举之声再度兴起,武举改制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897年,唐文治主张改弓刀为枪炮,各处省城与大都邑分设水师或武备学堂,责成武生、武举入堂学习,除可以乡会试外,随时保举。这种做法扩大了武生员的出路,同时调动武生学习积极性。但在实践中也产生一些弊端:一是各省分设学堂,对武学教习需求量很大,但武官人数有限,难以“令其散往各属教授武生、武童”。二是旧有的武生、武举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即使有教习,能否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也很难说。同年,荣禄奏上《奏请设武备特科折》,提出“每省设一武备学堂,由各省督抚,详加考试。凡考列优等者,作为武举人,其名数略参科场旧例,分别大省中省小省,各不得逾本省原额十分之五,此为武备特科”。通过武备特科的设立,改革武举以造就新式人才。1898年,给事中高燮曾上《议设武备特科折》,进一步提出武备特科应从五个方面来确定录取标准,其一为娴韬略兼贯中法西法,其二为熟舆地工测绘,其三为练身体善击刺,其四为习洋枪洋炮及中国擅长火器;其五为精制造创新械。经过长期激烈的争论,武举改良派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光绪二十四年受到了成效,清王朝终于下诏改革武科,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规定“各直省乡试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科为始,会试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开始,一律改试枪炮,其默写武经一场,着即行裁去”。然而,半年后,慈禧太后下懿旨要求“所有武场童试及乡会试,均著仍照旧例,用马步箭刀弓石等项,分别考试”。因为“武科改试枪炮,原为因时制宜起见,惟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至于训练操防,尤为营伍学堂为储材之根本”。武举改良派的改革道路到此终结。

## 二、清末武举革命派的主张与评析

武举革命派主要主张废除武科,希望采取武科举外的其他方法来实现得人的目的。

武举革命派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停武议》中就提出“宜停罢大小一切武试,一归之荐举”<sup>[4]</sup>。冯桂芬在文章中提到无论骑射弓刀,考试时不免有发

挥失常的时候,而臂力大小是一定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将士子臂力大小作为区分高下的办法,在降低应试难度、扩大应考人群、防止遗漏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仅凭此条件选拔的人才,素质良莠不齐,难以保证入营学习顺利进行,徒有数量之裕,而无质量之精。

1878年,两江总督沈葆楨呈奏了《请停武闹片》,指出各省为举行武科消耗的经费“已数千金”,而武举所试得人“所用非所习”,对外不能御侮,徒有虚名,对内恃顶戴为护符,为害乡里。废止武科,每科各省共计可省金数万两,可以减轻民间负担。沈葆楨的奏折指出了旧式武举腐朽空虚,图劳民伤财的本质,但未给出解决办法,骤停武举子进身之阶,如鲛治水,只堵不疏,恐激起民变。奏折呈递的当天就被批驳,也反映了清统治集团的上层虽然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到了惨败,也考虑创办军事企业、设立武备学堂等以促进军事近代化,但对祖宗法规的宗教性崇拜和对自己军事力量的盲目自信,使其根本无意改革变通武科,更谈不上废除了。慈禧的申斥旨意,引起朝野震惊,使朝臣惴惴不安,废除武科之议只能由公开转到私下进行。

随着清王朝内外患愈益加剧,中法之战、中日之战,清王朝一败再败,在总结战争失败原因时,陕甘总督陶模奏称:“旧有武科得人甚少,倘谓弓矢无益而习火器,则家家可置枪炮,流弊尤甚。”<sup>[5]</sup>因此,“似应将旧列武科一律停止”<sup>[6]</sup>。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彻底粉碎了清王朝企图苟且偷生的迷梦,给清王朝致命的打击,新编陆军损失殆尽。这次失败极大地刺激了清王朝统治集团的神经,张之洞、刘坤一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再次提出“停罢武科”<sup>[7]</sup>之议,针对社会上反对废除武科的种种议论,进行了逐一反驳。针对有人认为武生武举可以购置使用枪炮,习练应考的看法,张之洞、刘坤一指出如果枪炮一类的利器散布民间,流弊太大,国家没有防察之法,针对武生可入武备学堂学习的看法,张之洞、刘坤一指出武生多不通文法。针对武科可以收拢强梁不驯的人维护社会稳定,张之洞、刘坤一指出凡应考试的人,大多是小康之家纨绔子弟,国家取士求将,是要得良善守法之士,教之以礼仪,传授以技能,以备干城心腹之用。怎么能搜罗那些不逞之徒,做“加虎以冠”的事呢?针对有人列举古今名将也有未能尽知书者,张之洞、刘坤一指出古今之良将,多为学古

能文之士,偶然有几个学问不高,也多由阅历而来,经过了长期战争生活的锻炼。而现在应试武举之人,平日所习与兵事无涉,既不晓枪炮之理,又不谙营阵之法,及取中武科后,年岁已大,很难有军事实战阅历等等。1901年,清王朝在内外压迫之下,终于下决心停罢武科,同年七月十六日颁布上谕:“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已久,流弊滋多……嗣后武生童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

## 三、清末武举改良派与革命派异同比较

清末武举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不同之处主要存在于基本主张和最后结果两个方面。首先,在对待武举制度的基本主张方面,改良派主张通过对旧有武举制度中科目的改革或增减,如刀箭弓石改试枪炮,增设水师科等手段,维护武举制度的存在。武举革命派主张废止旧有武举制度,采用举荐法或从行伍中或武备学堂挑选人才等替代方式完成军事人才的选拔。其次在最后结果方面,改良派的主张在1898年上谕下令武举改制时达到了顶峰,但仅过了半年慈禧太后的懿旨就改回旧制“所有武场童试及乡会试,均著仍照旧例”,武举革命派的主张获得了成功。在张之洞、刘坤一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上奏一年后得到了“嗣后武生童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的上谕。

清末武举改良派与革命派也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首先,代表人物范围相同,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是涵盖了从民间有识之士到朝廷封疆大吏甚至亲王。其次,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一致,虽然改良派和革命派围绕武举制度存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但无论哪一方,其出发点都是培养选拔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式军事人才,抵御外侮,富国强兵,根本目的都在于维护清王朝封疆统治。第三,客观上积极作用相同,无论是要变革武举的改良派还是要废止武举革命派,主观上采取的措施不同,但双方都造就了相当数量的新式武备人才,促进了士民习武之风,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现代化。

### 参考文献

- [1]魏源.魏源全集(第4册)[M].岳麓书社,2005.
- [2]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 [3]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Z].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 [4]冯桂芬著,戴扬本评注.校邠庐抗议[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5]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1-8)[M].台湾学生书局,1965.
- [6]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471)江楚会奏变法三折[M].文海出版社,1966.

★作者王晓勇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在读博士。